

軍國主義統治下左翼知識份子的幻想

● 孫傳釗



小林英夫、福井紳一：《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新発見史料が語る「知の集団」の見果てぬ夢》（東京：小學館，2005）。

戰後，日本史學界關於「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略稱）的研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即使關於「滿鐵調查部事件」的研究成果也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但是，最新出版的小林英夫和福井紳一合著的《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新発見史料が語る「知の集団」の見果てぬ夢》卻

從另一個視角着手，通過滿鐵調查部事件來追溯當年的日本左翼知識精英如何幻想在軍國主義體制下「理性地」研究、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關東軍憲兵隊的嚴厲鎮壓下，最後又如何放棄「信仰」而「轉向」的歷史。所以，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書也是對戰時日本左翼知識份子言論與行動的一個側面研究的成果。1996年出版的小林英夫的《滿鐵：「知の集團」の誕生と死》（東京：吉川弘文館）雖然已經言及滿鐵的左翼知識精英活動及其遭受鎮壓的「調查部事件」，但因為第一手史料尚少，語焉不詳，而新著《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利用了中國吉林省檔案館所藏關東軍憲兵隊逃遁前來不及燒毀的、沉睡了整整六十年的五十多件檔案。這些1943年的關東軍憲兵隊審訊檔案，先收藏於吉林省公安廳，1982年起轉到吉林省檔案館。當中包括滿鐵調查部事件中被憲兵隊逮捕者、即前滿鐵調查部研究員的審訊後的供詞、反省書（反省聲明）和憲兵隊的命令、處理意見等。這部新著對這些左翼精英當年的調查活動、研究成果、思想背景及其內部派系矛盾與衝突都給以了詳盡的史實描述與分析。書

《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一書，通過滿鐵調查部事件來追溯當年的日本左翼知識精英如何幻想在軍國主義體制下「理性地」研究、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關東軍憲兵隊的嚴厲鎮壓下，最後又如何放棄「信仰」而「轉向」的歷史。所以，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書也是對戰時日本左翼知識份子言論與行動的一個側面研究的成果。

「滿鐵調查部」的前身「滿鐵經濟調查會」從1932年成立一開始就是受關東軍直接控制的機關。一戰後，滿鐵就形成了優先採用東京和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生慣例。所以，「滿鐵經濟調查會」出版的《滿洲經濟年報》所刊論文、調查報告的執筆者幾乎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的「講座派」大上未廣等研究者所壟斷。

中許多內容於今天的中國學人也不乏有所啟示的地方。

「滿鐵調查部」的前身「滿鐵經濟調查會」從1932年成立一開始就是受關東軍直接控制的所謂的「民間機關」，為「滿洲經濟建設政策」的制定進行調查、論證和研究的機構，人稱之為「關東軍經濟參謀本部」，是「滿洲國」傀儡政府財政部的指導、諮詢機構。30年代「滿鐵經濟調查會」僱用的從事調查、研究的職員，絕大多數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接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知識精英，都經歷過30年代初「講座派」與「勞農派」論戰的洗禮。「講座派」是指1931年岩波書店出版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叢書的執筆者群體，這個群體強調明治維新只是改朝換代，雖然明治政府推行產業革命，但依然是具有封建地主階級性質的政權，從30年代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看，日本還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社會。與「講座派」持不同觀點的「勞農派」是指結集在《勞農》雜誌周圍的知識群體。他們認為明治維新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過明治時期、大正時期的產業發展，日本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前者認為日本社會面臨的課題是要進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而後者卻認為當時日本社會需要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可以說是大正年間自由主義思潮的餘波，也反映了戰前的日本國家體制，對左翼社會政治運動殘酷鎮壓的同時，對少數知識精英的學問領域的純粹意識形態的研究與宣傳還是網開一面的。30年代這場大論戰影響深遠，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日本共產黨的幹部是所有政

黨中平均學歷最高的，大學集中的京都是共產黨最具有選舉優勢的地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滿鐵就形成了優先採用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生的僱用慣例。所以，「滿鐵經濟調查會」研究成果的年刊《滿洲經濟年報》所刊論文、調查報告的執筆者幾乎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的「講座派」大上未廣等研究者所壟斷。而「滿鐵經濟調查會」最初的這些傾向「講座派」成員在理論上還受到當時主持《滿洲評論》周刊的橋樑「農本主義」的影響。這些「九·一八」事變後開始活躍起來的研究者被稱為「經調派」或「年報派」，於是就出現這樣的奇特現象：關東軍激進的右翼青年軍人中盛行的「反財閥」、「反資本主義」、「擁護農本主義」思潮，與「經調派」為關東軍制定統治「滿洲」的國策效力而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滿洲」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歷史、現狀得出的結論有一種親和性，竟然會融合起來。例如，「經調派」大上未廣等在1936年提出的「滿洲產業開發永年（長期）計劃案」，這個計劃中可以看到1933年至1935年《滿洲經濟年報》所刊論文中的種種觀點的痕迹：把「滿洲」社會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農業社會」；又如，重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分析農業危機問題（高實物地租率的零星的小農經濟結構、世界經濟危機帶來農作物價格和出口量的暴跌引起農家收入劇減）；再如，提倡解放貧農、開展協同組合（合作社）運動。雖然這一「永年（長期）計劃案」因為沒有重視與軍需相關的工業發展，最終只成

為「滿洲產業發展五年計劃」的一部分而沒有全部被採用，但是，方案提出的所謂農業合作社政策，以後一直作為未來「滿洲」經濟發展要實施的政策，受到興亞院當局的重視，1937年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活躍的另一刊物《滿洲評論》主編佐藤大四郎還去綏化縣試驗、實踐這個合作社計劃、設想。

引起筆者興趣的另一問題是「七·七」事變後發生在滿鐵調查部內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滿洲」社會改革實踐結合起來兩派知識精英之間的論爭。「七·七」事變後隨着侵華日軍軍事上的擴展，滿鐵調查機構承擔的課題也激增，調查部從產業部獨立出來，規模也急劇擴大，1940年發展到擁有2,345名僱員的巨大規模。因為課題堆積如山，所以「不拘一格」採用人才，即使有思想問題前科者、「轉向者」，只要有可靠人推薦，確實有研究能力，也可以進滿鐵調查部就業。這大批「中途採用」的研究者大多分配在資料科，人稱「資料科派」或「外來派」。他們中不少人雖然有相當年資，也懂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理論，但是，他們的待遇遠不如大上未廣等早先就業的「經調派」，因此不久就產生「資料科派」與「經調派」的暗鬥。此書附錄的不少史料都是「資料科派」的成員被逮捕後在坦白、反省的時候陳述兩派鬥爭的供詞，言詞裏充滿對「經調派」蔑視和批判。比如，「資料科派」鈴木小兵衛等認為「滿洲」革命的動力在於工人，而「經調派」大上未廣等人則認為當地革命的動力在於農民；又如，大上認為「七·七」事變的根源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爭

奪中國市場，而鈴木等則認為那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衝突加劇。再如，鈴木等批判大上等的社會改良政策只是書齋派紙上談兵，而自己一派要推動的是工農運動、意在真正的社會變革，是真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但大上認為那是脫離客觀實際、缺乏科學理論的觀點，主張自上而下的改革。

這種企圖在軍國主義體制下的、在關東軍憲兵隊嚴密監視下的兩派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爭與「理性實踐」很快就成了泡影。在1942年9月11日與21日憲兵隊的兩次統一行動的大逮捕中，共逮捕了四十四名滿鐵調查部僱員，「一舉搗毀了在『滿洲』的日本人共產主義運動的溫牀」，滿鐵調查部幾乎陷於癱瘓狀態。

因為這些「秀才」在審訊階段都表現出悔改、「轉向」的態度，結果四名免於起訴釋放。被起訴的四十名中，十五人保釋。其餘的除了五人病死獄中外，都得以從輕發落：二十人被判年以下的徒刑，都是緩刑執行。事件牽連者中不少人戰後在大學執教，從事學術研究。其中也出了不少社會活動家，最典型的是伊藤武雄，1946年回國，1950年參與創立日中友好協會，任協會理事長。

從事這離奇的期望把軍國主義國策與自己所追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起來的調查、研究的大多數滿鐵調查部的僱員，都出自日本最高兩所學府——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在就業很困難的年代裏，這些精英一般都還能尋到很好的職業，他們也知道這樣做所要承

「七·七」事變後，滿鐵調查部因為課題堆積如山，所以錄用大批「中途採用」的研究者，人稱「資料科派」或「外來派」。不久就產生「資料科派」與「經調派」的暗鬥；「資料科派」稱自己要推動的是工農運動、意在真正的社會變革。1942年9月憲兵隊兩次大逮捕共逮捕了四十四名滿鐵調查部僱員，「一舉搗毀了在『滿洲』的日本人共產主義運動的溫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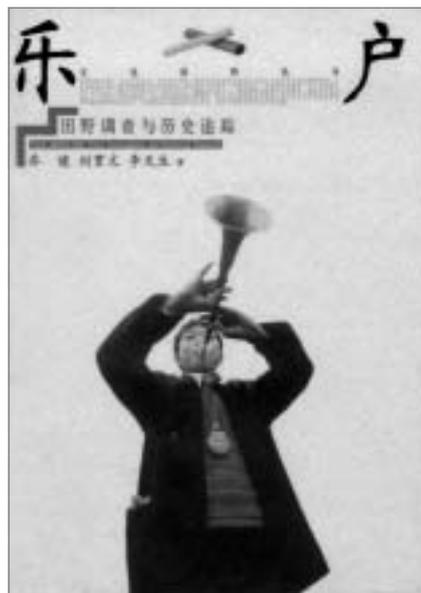
擔的風險和後果，將會成為有前科者、非國民，會失去謀生的飯碗。從這點上來講，他們確實也是真誠地追求理想的一個群體，儘管這種幻想很快在嚴峻現實中破滅，在知性主義沒有根基的日本社會這也是很可貴的。我想，小林英夫把他們叫做「知的集團」的原因就在這裏。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教訓：理性也會為邪惡所利用，軍國主義殘酷的殖民統治也不放棄利用理性和科學來提高其管理(奴役)

效率。如果說獲得三項獎、風靡一時的小熊英二名著《民主と愛國：戰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敘說了戰後日本知識精英在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夾縫中進行艱難探索的歷史與個案，那麼，《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一書是作為它的佐證，追溯了這種探索的歷史源頭的一隅。這些日本學者讀解二十世紀知識精英的著述，值得中國關心知識份子問題研究的同好一讀。

「二重」閱讀與「底邊社會」的歷史

● 王成蘭

喬健等人所著《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探討了樂戶及其所組成的「底邊社會」的圖景。此著把樂戶定義為生存於傳統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賤民中「最突出的一種」。「底邊社會」是喬健提出的新概念。他認為，「『底』是指社會地位底下，處於社會底層，『邊』就是指邊緣。」底邊階級「是在士農工商所謂四民之外，一般都是從事非生產性」。



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樂戶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身處賤籍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他們大都從事歌舞音樂等賤業，供官府、王府或者宮廷使役(日本學者寺田隆信研究認為，樂戶在依靠作為本業的歌舞來維持生計外，有的還擁有作為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的土地。參見寺田隆信：〈關於雍正帝的除豁賤民令〉，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489-90)；另編籍貫，世代相襲。明朝「靖難後，諸王有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來相沿未革」(《清高宗實錄》，卷五十，乾隆二年九月壬辰條[台北：台灣華文書局]，頁900)。此後的樂戶，多是這些人的後裔，且多分布在山西地區。二十世紀80年代